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二辑〕

赵树理小说的 民间化叙事

白春香·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二辑〕

赵树理小说的 民间化叙事

白春香·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化叙事 / 白春香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378-4608-0

I. ①赵… II. ①白… III. ①赵树理(1906~1970)—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4022号

书 名 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化叙事
著 者 白春香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608-0
定 价 36.00元

《赵树理研究文丛》编委会

主 任：杜学文 张志仁

成 员：赵魁元 杨占平 傅书华 和 悦

续小强 宋丽云 贾大一

主 编：赵魁元 杨占平

总序

赵魁元 杨占平

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是20世纪大众化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他所实践与倡导的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态度，曾经影响了几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虽然没有置身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但也分明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同样对赵树理年轻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冲击。这让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影响的赵树理，能以一种民间姿态、“草根”意识来思考问题；而新文化关于自由、平等，关于科学、民主的追求，又使他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对既有一切的不满。于是，在赵树理身上形成了一种“我即是民”“民即是我”，“民”与“我”一体的思想观念。他企望改变中国现实的追求既是改变普通民众命运的努力，更是改变他自己个人命运的努力。

赵树理几十年深深融入农村社会现实生活中，与广大农民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群众能够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失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农民的甘苦即是他自己的甘苦，农民的冷暖即是他自身的冷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他不像某些知识

分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常常站出来指点江山、布坛论道，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他要用自己回归到民间，回归到农民之中的实际行动，表明一个作家的态度。

赵树理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勇于在创作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他从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创造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现代小说样式和艺术语言。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说，赵树理的创作，完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他身处中国图新求变，努力改革落后面貌的十分特殊的时代，在他人生道路和作品中，折射出普通中国人追求幸福理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历程和精神情怀。

今天，文学已经进入21世纪，但赵树理所奉行的做公众的代言人和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精神，依然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值得广大作家、艺术家学习，更值得广大理论家研究。

因此，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赵树理诞生110周年前夕，隆重推出《赵树理研究文丛》，这是近年来研究赵树理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应当尽到的职责。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供职在各级文联或作家协会的评论家，有大专院校的教授，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赵树理做了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或许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开掘，都有可取之处。

我们认为，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与写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因研究者的身份和习惯各有特点各具风格的；但是，从这套丛书中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共性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独创性。我们感受到，近年来的赵树理研究，随着研究者对作家资料掌握的丰富多元，也慢慢形成了各自比较明显的观点。作为一种讲求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逐步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时，只能跟在作家或作品之后做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

赵树理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典型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和读者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研究者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通过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些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研究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分，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创性来。

其次是有真情实感。我们常常感到，当今的某些理论家做作家作品研究时，存在着一种浮躁现象，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某种学位证书或专业职称，很少去发掘课题的深层次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更有研究者本身内在的意图，而这种意图的核心，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真诚的感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赵树理研究界，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尤其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满怀真情实感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面对一辈子真诚做人、真诚处事的赵树理，面对赵树理决不违心写作的经典作品，研究者们都是用真诚的感情去研究。没有倾情付出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涣散的体现，枯燥文字的堆积。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具备了真诚的感情，能够体验到赵树理的内心世界，体验到赵树理作品的本真之处，写出的文章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都是有见地有思想的作品。

第三是立足现实。应当说，关于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研究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我们强调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赵树理及其作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价值评定，关键是要能用当下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现实性了。之所以说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赵树理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如果你的研究还停留在以往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种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难有多少价值让人们接受

的。由此可见，现实性是研究的灵魂。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秩序向规范化发展，文学逐步回归到了自己的应有位置，文学研究，包括赵树理研究也逐渐从尴尬境地走了出来。眼下，作家的创作显得相对轻松；研究者也随之放松了心态，在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评论，个性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挥。应当说，当下的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比较宽松的环境，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广大有志于赵树理研究的同行们，能够静下心来，不断更新观念，吸取新的研究方法，把赵树理研究推向全新的阶段。

这套《赵树理研究文丛》的出版，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晋城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真诚配合，北岳文艺出版社相关领导和责任编辑做了认真的编校工作，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五年八月

目 录

第一章 赵树理自觉的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艺术观 /001

一、从“艺术至上论”到“文摊文学家” /002

二、对“文摊”文学的坚守 /005

三、“民间文学正统论” /010

四、民间化叙事是赵树理小说自觉的文体追求 /014

第二章 赵树理小说叙事的口语化特征 /017

一、赵树理小说口语化语言的内在构成 /018

二、赵树理小说口语化语言的成因 /033

三、赵树理小说语言是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革新 /038

第三章 赵树理小说叙事的故事化特征 /042

一、对通俗故事的自觉追求 /042

二、赵树理小说故事化叙事的特征 /047

三、《邪不压正》的叙事分析 /059

第四章 赵树理小说叙事的民俗化特征 /070

一、无所不在的日常生活民俗 /071

- 二、别有风味的婚姻家庭生活民俗 /075
- 三、别具特色的精神生活民俗 /078
- 四、赵树理小说民俗化叙事的价值取向 /082

第五章 赵树理小说叙事的民间艺术思维 /087

- 一、赵树理小说叙事的曲艺化思维 /088
- 二、赵树理小说叙事的戏剧化思维 /095
- 三、赵树理小说叙事的白话小说思维 /101
- 四、赵树理小说叙事的评书化思维 /110

第六章 赵树理小说叙事的民间立场 /124

- 一、赵树理小说叙事民间立场的具体表现 /125
- 二、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在时代政治高压下的隐性表达 /133
- 三、“《锻炼锻炼》”的显隐叙事结构越 /142

附录 /159

- 底层文学应该如何写作
 - 以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为参照 /159
- 赵树理小说的叙述语法及思想意义 /169
-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
 - 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183
-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195
- 想像对现实的征服
 - 赵树理“问题小说”内在结构探微 /206
- 深厚的“农民情结”
 - 赵树理创作心态分析 /215

赵树理自觉的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艺术观

德国学者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对赵树理有这样的评价：“在艺术上赵树理并不属于‘五四传统’。他来自农村，操着农民的语言并且把自己看成他们的传声筒。他是一个用传统手法来糅合带韵散文的说书人。……他学习民间表达方法的天赋，令他无论如何也算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革新者”^①，顾彬对赵树理艺术创作的本质认识是深刻而到位的。的确，对民间文化的学习与借鉴，是赵树理一生自觉的艺术追求，在晚年他甚至提出“民间文学正统论”。

纵观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这一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艺术观的形成却并非与生俱来，从它的产生到确立，其间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坎坷的道路。概括地讲，这一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925年到1937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赵树理毅然抛弃了他在青年时期形成的“艺术至上论”的文艺观，而转向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赵树理民间文化艺术观的初步形成期。

（二）从1937年到1943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赵树理在文艺

^①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99页。

界人士齐声反对的逆境中，努力坚守着“文摊文学家”的信条，并在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是赵树理民间文化艺术观的确立和巩固期。

（三）从1943年一直到逝世为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赵树理由于《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他“文摊”文学的艺术观终于得到时代政治的认可，但却始终没有能够在主流文艺界占主导地位。五六十年代，为了挽救濒临困境中的民间文艺，赵树理的艺术观逐渐走向偏执，滑向“民间文学正统论”。这是赵树理民间文化艺术观的进一步发展期。

一、从“艺术至上论”到“文摊文学家”

赵树理从1925年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新学堂时候起，就与“五四”新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度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地步，在这个时期，他树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对赵树理颇有研究的董大中先生曾谈到这一点：“据赵树理说，他原来是个‘艺术至上主义’者，并且着实学习过欧化句法，练成了一口学生腔”^①。实质上，在这一时期，赵树理“艺术至上”论的产生是与其个人主义思想紧密相连的。早在他1930年写的《读书·做人·革命》中，他就坚定地认为，首先要“求生存”，其次才是闹“革命”，“做人先成了问题，还怎么革命？”^②；在同时期写的《悔》和《白马的故事》中，也明显地流露出浓郁的悲观沉闷的个人主义情绪。赵树理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表现在艺术追求上就必然产生“艺术至上主义”。

在个人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赵树理1930年从自新院出来一直到1937年，便开始了“萍草一样的漂泊”的个人奋斗：他既饱受“在太原和故乡教书或流浪”的艰苦，看到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也体验了在走投无路的境遇中跳湖自杀的苦痛。这一艰难的个人奋

^①董大中：《鲁迅与赵树理》，董大中主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03页。

^②赵树理：《读书·做人·革命》，《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斗经历使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个人要“求生存”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前提之下，否则，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求生存”的。这段时间，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开始坍塌了，为全体受苦受难的大众谋生存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取而代之。实际上，早在自新院时，赵树理的思想深处已经播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他曾经说过：“有一位高春生同志，为了纠正我的文艺观，也和王春纠正我的江神童思想一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认真和共产主义思想接触，是在这时候才开始的”^①。在这段“萍草一样的漂泊”的生活磨难中，曾经播下的共产主义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1936年他在“上党公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课堂上，就一再告诫学生：“努力呀，努力呀，人生要奋斗！”，“要为国为民办好事”^②；在同年写的《文化与小伙子》一文中，他也明确地声称，自己要做一个引导“中国弄锄头的小伙子们”挣脱其“命运”的引路人，“须得自己站在前面向小伙子喊声‘照我来’！”^③；在紧接着发表的《雅的末运》中，也极力号召文化人要彻底摆脱“雅之道”，并以满腔的“热”忱投身于时代的“俗务”中去^④。显然，这时的赵树理，在艺术观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文化要与现实相结合，文化人要充当“小伙子们”（农民）的引路人。在这种进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赵树理开始重视艺术对农民大众的启蒙作用。

那么，如何来创造能让“小伙子们”真正喜欢的文化呢？在这段时间，赵树理通过对“五四”文学的理性审视，终于发现：“新文学的圈子狭小的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习写这样的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写的东西事实上又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去。这只不过是在极少数的人中间转来转去，从文坛来到文坛去罢了”，^⑤而“立过案的新旧各体诗，在现在的农村中根本算是死的”，“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

①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②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③赵树理：《文化与小伙子》，《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④赵树理：《雅的末运》，《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⑤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页。

中根本没有培活了”^①。在认识到“五四”小说的艺术形式与农民的审美习惯相距甚远这一弊端之后，赵树理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现在不是什么组织文坛的问题，而应该搞‘文摊’。他鄙视文坛，对上海十里洋场的文坛很不以为然，表示厌恶洋场恶少。他认为，大家应搞点唱本、蹦蹦，群众花一两个铜板，就可以听书、看戏，得到娱乐，我们要做艺人，到民众中滚去，不要做什么艺术家”^②。

站在决心为民众创作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的艺术立场上，赵树理决心走“文摊”文学的道路。他曾经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作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向”^③。他之所以不想上“文坛”，而要摆“文摊”，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坛农民攀不上去，只有摆“文摊”，才是农民喜闻乐见的，也才能从思想上真正地启蒙农民，从而真正地“夺取封建文化的阵地”。可见，赵树理的“文摊文学”论，实质上，是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地把农民置于“隐含读者”的位置，并在充分满足农民的审美需求的条件下，最终与农民达成一种有效的交流。这样的创作由于充分重视农民的审美习惯与审美兴趣，因而弥补了“五四”新文学在艺术形式上与普通民众隔膜的弊端，从而最终得到了民众的接受。

在这一“文摊文学”艺术观的指导下，这一时期，赵树理创作了《有个人》《金字》和《盘龙峪》等小说。在这些小说中，那种像《悔》和《白马的故事》的欧化句法已经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熟悉的讲故事的书场格局和口语化的叙述话语；思想内容上也不再流露出阴郁沉闷的情调，而是表现出对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和对农民正在觉醒的斗争意识的欣喜。这几篇小说已经给我们清晰地展示出赵树理小说大众化风格的雏形。自此以后，创作这种为农民喜闻乐见的“文摊文学”便成为赵树理一生的艺术追求，他自己也曾经说：“我有意识地使

①赵树理：《艺术与农村》，《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②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456页。

③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其后一直坚持了下来。”^①

二、对“文摊”文学的坚守

赵树理树立了“文摊文学”的艺术观之后，走“文摊文学”的道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阻力主要来自同行的奚落。从1934年这一艺术观的萌芽一直到1943年它被时代政治认可，在这近10年的时间中，赵树理在难以想象的逆境中顽强地一直把它坚持下来。

如果说上一阶段赵树理搞“文摊”是从启蒙民众出发的自觉追求，那么，在这个阶段，在全民族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抗战洪流中，在“救亡”和“启蒙”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赵树理对“文摊”文学的追求已经成为时代历史的迫切需要。对于这一点，赵树理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他在1941年发表的《通俗化“引论”》中，就深刻地指出了“通俗化”在这个时代的两个重要内涵：第一应作为“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第二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大众”，是“新启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通俗化”应肩负起“救亡”和“启蒙”的双重时代重任。

正是由于对“通俗化”有着这样的理性认识，赵树理从1937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在最基层的小报编辑工作上，就克服了重重压力，努力坚守着“文摊”文学这块阵地。从1939年到1941年，赵树理一共编了三份报纸，第一份是《黄河日报》的副刊《山地》。对于立志要搞“文摊”文学的赵树理来说，《山地》无疑给他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把多年的理想化为现实——其中形式上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无所不包，而总的政治内容以发动人民抗日、揭穿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为范围”^②。而让赵树理更为欣喜的是，他在《山地》上所进行的“文摊”文学的实践初战告捷，《山地》不仅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很好地发挥了抗日宣传动员的作用。他自己曾谈到《山地》刊出后民众火热的接受状况：“那时的小报

^①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②赵树理：《忆王春同志》，《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与任何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看看，往往弄得路为之塞”^①；当时任北方局领导的杨献珍也曾回忆说：“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我也是从《山地》副刊上，加深了对赵树理创作大众文艺本身的了解。他的文章浅显生动、干净利索，连‘啊、了、吗’之类的虚词都不随使用，文风朴实幽默，措辞严谨，老实讲我很佩服和赞赏”^②。第二份报纸是一二九师的一个小报《人民报》，赵树理编这份报纸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月，但其“文章风格上继续了《山地》之风”^③；赵树理编的第三份报纸《中国人》，“仍继续《山地》之风，尽情地暴露敌人的残暴、丑恶，发挥了点匕首之技”^④。在这份报纸上，赵树理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把《中国人》办得通俗易懂、形式多样，小说、诗歌、话剧、唱剧、鼓词、快板、寓言、相声、杂文、语录、讽刺笑话、民间歌谣……真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华山曾由衷地赞叹道：“对他运用通俗文字的才能佩服极了，总共几千字的一期小报，居然能搭配出那么多栏目，抗日根据地的新事物和新的政治概念都要宣传出去，还要明白易懂，引人入胜，真了不起”^⑤。这样的报纸自然很受欢迎：“不仅敌占区同胞喜欢看这个报，石印工友们也一边印，一面朗读着他的作品。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好几年的一位缮写员，曾背诵过一段他在三四年以前的嘲笑日汪的‘新相声’给我们听，逗得大家笑了一场”^⑥。

总的来说，通过编辑这三份报纸，赵树理不仅充分展示了他搞“文摊”文学的卓越才能，而且他的“文摊”文学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

①赵树理：《忆王春同志》，《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②杨献珍：《暮色苍茫念手足》，载《中国通俗文艺》，1982年第11期。

③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第375页。

④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第375页。

⑤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⑥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黄修己主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欢迎，从而很好地完成了文学“启蒙”和“救亡”的双重重任。此时的赵树理已经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通俗文学作家了。赵树理的“文摊文学”能够赢得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虽然使他倍感欣慰，但是，赵树理在搞“文摊文学”的同时，也在精神上和工作上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和考验。

首先是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对于赵树理的“文摊”文学的主张，当时文艺界的大部分人都是反对和鄙视的。在他主编《山地》的时候，主张纯文学的主编就认为他写的东西实在不雅，有辱文学的形象，最后就把他调到司务处管伙食去了，《山地》也被洋味十足的《晨钟》所取代^①。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不时地受到文艺界同行的排挤和奚落，他们曾别有意味地送给他“庙会作家”和“快板诗人”^②的外号，而且经常就文艺问题，与他发生激烈的论战。当时报社的一位同事就曾回忆说：“关于新文艺问题，当时在报社有两种意见。有一部分同志认为新文艺应该以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的成功作品为标本，强调语言的科学化，文体的现代化，对明清以来的通俗章回小说重视不够，瞧不起普通的群众性的文艺，认为太土气；主张这种意见的占多数。另有少数同志，以老赵、王春为代表，力主文艺应该通俗化、群众化、大众化，积极拥护鲁迅关于大众化的主张，认为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不够通俗化、大众化，那些人把这样的作品当标本是追求洋气，崇拜欧美外国文学，不值得取法。有时候争论起来很激烈，甚至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③。面对多数的反对派，赵树理并没有因为自己势单力薄就缴械投降，而是毫不示弱，全力抗争：在1941年，他积极发起并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之后，又在《抗战生活》上，连续发表了《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通俗化观点；在1942年初晋冀鲁豫区召开的文化人座谈会上，面对云集

①据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自述：“后来主编换了人，新来的主编以为《山地》不够艺术，另换了名字叫《晨钟》，专登些新诗、新小说，并且另换了编辑，把我调作司务长管伙食去了。”《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

②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③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